

“《儒藏》工程编纂工作研讨会”综述

由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主持召开的“《儒藏》工程编纂工作研讨会”2009年4月25日在北京大学举行。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邀集韩国、日本、越南的专家学者，与中国的专家学者一道，共同就《儒藏》精华编收录的“域外文献”的体例、选目、校点及组织工作，进行密集的研究和协商，并予以进一步落实。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魏贻恒、北京大学副校长张国有出席会议并致辞，《儒藏》工程首席专家、《儒藏》总编纂汤一介作关于《儒藏》工程工作情况的报告，《儒藏》总编纂安平秋、孙钦善分别主持上午和下午的会议，北大社科部部长程郁缀、副部长耿琴，北大《儒藏》编纂中心常务副主任魏常海、副主任吴同瑞以及来自中、韩、日、越等国的4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张国有副校长首先致辞。他指出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主要任务是交流国际合作的经验，并达成共识。他认为编好《儒藏》有几方面的因素：一是要狠抓质量，二是要加强协调与合作，三是要有充足的经费，四是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他认为《儒藏》工程目前的状态是好的，需要特别强调质量，同时北大与教育部一起想办法争取经费。他代表北大对来自韩、日、越等国的专家学者表示特别感谢。他最后表示今年8月份教育部要办一个成果展览，借此机会要将《儒藏》工程推向更高水平。

魏贻恒处长代表教育部对会议表示祝贺，对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表示欢迎。他指出《儒藏》工程是教育部最大的文科项目，教育部有关部门将不遗余力地继续做好服务工作。他指出五年多来《儒藏》工程在汤一介先生的精心组织下，按照教育部的要求，经过北京大学和海内外的学者联合攻关，在出成果、出人才、出经验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希望各国学者经过这次会议交流讨论，达成共识，并进一步通力合作，共襄盛举。

汤一介先生作了关于《儒藏》工程工作情况的报告。他首先指出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邀集韩、日、越等国的专家学者与中国的专家学者一道共同讨论《儒藏》精华编域外文献的编纂工作。他指出北京大学主持的《儒藏》工程一开始就得到韩、日、越等国学者的支持和帮助，目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此他对韩、日、越等国的朋友表示感谢。他指出编纂《儒藏》精华编是一个巨大的项目，其中中国部分收录儒学文献460余种，目前已收到校点稿227种，已出版10册。同时还收录韩、日、越等

国的儒学文献 100 余种。《儒藏》精华编的韩国部分，在梁承武教授的主持下，已经召开过 37 次编委会议，即将完成选目工作。目前北大与韩国成均馆大学已签订合作编纂《儒藏》的协议，这对完成《儒藏》精华编韩国部分的编纂是有力的保证。他表示韩国学者的负责精神使他深受感动。《儒藏》精华编日本部分的编纂，在户川芳郎教授的主持下，在二松学舍大学的支持下，已确定收录日本文献 44 种，目前已提交 5 种样稿、4 种全稿。他表示日本学者的敬业精神使他深为敬佩，同时对日本东方学会所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儒藏》精华编越南部分的编纂，在阮金山教授的领导下，12 种选目已经确定，校点人员也已落实，全部校点工作将于今年完成，其中 7 种已交稿，对此他表示非常感谢。

汤先生介绍，教育部 8 月份将举办一场科研成果展览会，《儒藏》工程计划出版精华编 30 分册、《中国儒学史》10 卷、《儒藏总目》经部，同时出版日本、韩国、越南文献各一册，并翻译出版日本仓石武四郎《本邦中国学之发展》一书，以供展览，希望借此推动《儒藏》工程。他还介绍，饶宗颐先生最近为《儒藏》工程题写了一副对联：“三藏添新典，时中协太和”，以示对《儒藏》工程的赞赏和鼓励。

汤先生指出，《儒藏》工程包括编纂与研究两个方面，前一段时间主要抓了编纂工作，现在还要抓好研究工作。他还指出，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协调、解决编纂工作中的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各国之间在选目、体例上会有不同认识，经过讨论可以达到基本的统一，同时也要保持各国儒学的特点。

汤先生表示，《儒藏》工程进行了五年多，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管理系统已做成了光盘，可以供韩、日、越等国参考。他还表示，《儒藏》工程也形成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这是世界历史上跨国的大事业，对人类的贡献将是巨大的。

汤先生最后表示，中国有句老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儒藏》工程是难度很大的事业，正因为它困难，我们不能不做；正因它的意义很大，完成它就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他表示一定会追随参加这项大事业的中、日、韩、越专家学者之后，尽职尽责，奉献自己的力量。

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东方学会会长、《儒藏》精华编日本部分主编户川芳郎先生报告日本文献的编纂情况。他首先介绍了工作经过，日本 06 年 10 月成立《儒藏》日本编纂委员会，并委任一批委员，07 年 10 月召开《儒藏》日本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随后 12 月在深圳召开《儒藏》主编工作会议，确定了日本儒学文献的编纂体例和校勘条例，会后充实了一些环节，做了一些样稿。08 年 6 月底北海道大学、大阪大学陆续提供样稿，根据样稿情况，08 年 10 月召开《儒藏》日本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提供《〈儒藏〉整理要领》。在日本分派工作的方式是以各大学教研室为单位，目前大阪大学已提交稿件，北海道大学已提交样稿。《儒藏》精华编日本儒学文献主要收录刻本，另

有一部分是抄本。他指出目前文献的整理工作尚处于初级阶段，碰到问题先由各大学教研室调整，也可反映到日本编委会，再反映到北大《儒藏》编纂中心。他介绍日本也有自己整理校点古籍的传统，二战后也出现了大型古籍丛书，《儒藏》整理日本汉籍，有日本异体字的问题，也有用中文还是日文来阅读的问题。同时中国文献传到日本也有二次解读，如日文“训点”，这次整理时都删掉了。他认为整理中文撰写的部分，同时关注日文，这对校勘有积极的作用。另外，日本的各种刻本、抄本用不同的异体字，如何规范需要研究。日本京都产业大学副教授久米裕子女士补充介绍了她的母校大阪大学管理怀德堂藏书及其工作小组的情况。

韩国中央大学名誉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儒藏》精华编韩国部分主编梁承武报告韩国文献的编纂情况。他首先代表《儒藏》韩国编纂委员会对会议主办单位表示感谢。他从选定时代、对象、内容、数量等方面介绍了韩国《儒藏》选目的标准，并介绍了目前选目工作的成果：经部共选定22人、24种、共513万余字，史部共选定9人、9种、共706万余字，子部共选定20人、39种、共596万余字，集部共整理选定32人、32种、共计607万余字。这些还需调整。他还介绍了韩国《儒藏》编纂工作最新进展：韩国编委会与成均馆一道继续向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申请经费支援；与成均馆大学儒学东洋学部达成共识，由成均馆大学《儒藏》编纂中心担任韩国《儒藏》编委会的主管单位；同时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与成均馆大学《儒藏》编纂中心也达成了学术交流协议。他预计韩国年内可完成集部的选目工作，并按计划继续进行版本选定、标点、校勘等工作。

越南国家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中国学中心副主任、《儒藏》精华编越南部分主编阮金山报告越南文献的编纂情况。他介绍越南文献编纂工作从2007年开始，先选择了10种，后又增加了2种，一共选取12种文献；校点工作完全按照《儒藏》编纂体例进行，目前已完成7种，争取今年5月完成全部校点工作。《儒藏》精华编收录越南文献总计100余万字，可分成两册出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杨立范副总编表示，200年是特殊的一年，要向建国60周年献礼，作为承担《儒藏》出版任务的北大出版社，在7月底前要完成《儒藏》30分册、《中国儒学史》9卷、韩日越各一册的出版任务，压力很大。质量问题也是时间问题，中心的稿件要有保证，出版社全力配合中心的工作。

中华书局王国轩编审介绍了通审日本稿件《大学杂议》、《中庸逢原》的情况，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意见。

下午的座谈主要围绕选目的标准和版本的交流进行。

日、韩、越学者首先介绍了各国《儒藏》精华编选目的情况。

日本文献主要是按照收录既具有日本特色、又是用汉文撰写的儒学著作的要求，同时依据日本传统学界对儒学资源的三分法即按朱子学、阳明学和第三类的分类方法——此外也增加了一些注重考据的朴学著作——挑选出各派最重要的儒学著作，然后依四部分类法重新排序。

韩国文献是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着重挑选那些有新的见解、能够反映韩国儒学特色的著作，如经部关于礼类、四书类的著作，如集部中韩国著名儒学家的著作。

越南文献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经部如《易经》、《书经》、《孝经》、《论语》的文献，另一部分是有关儒学的札记、随笔及家训、圣训、族约家规等文献。

应要求，安平秋先生系统介绍了日本、美国所藏宋元版汉籍的状况，韩、日、越等国学者也分别介绍了各自国家所藏汉籍的情况。与会各国学者普遍认为通过《儒藏》工程的国际学术合作和文化交流，可以大力推动各国汉籍版本的流通，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

下午的座谈还就编纂体例、校点说明、底本、标点、校勘、字体、审稿制度、工作流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些问题既需要统一规范，又需要顾及各国的特点。其中，魏常海先生针对审稿制度特别指出，目前的审稿制度是就中国的情况制定的，如何与韩、日、越等国接轨和变通，需要与这些国家的编委会、主编进一步商量讨论。

汤一介先生对这次会议作了总结。他强调这次会议——包括在此期间分别与韩、日、越等国学者举行的三场小型会议——对预定的各项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很多问题得到了解决。他指出韩、日、越三国的主编任务繁重、责任重大，如果没有三位主编的配合，工作很难做好。他认为，根据这次会议计划的主要议题，一是讨论工作报告，二是征求对《儒藏》编纂体例的变通办法，三是协商审稿制度、工作流程的衔接方式，四是落实2009年8月之前韩、日、越三国各出版一册的计划，至此主要议题都已完成、甚至是超额完成任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最后，张国有副校长作了重要讲话。他再次对出席会议的韩、日、越等国的学者表示感谢。他认为这次国际性的协调会议非常有成效，像组织《儒藏》这样大型的学术文化工程无先例可循，一定会产生很多问题，必须进行沟通、交流，以便及时解决问题、推动工作。他指出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北大出版社的副总编、编辑部主任，出版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出版工作和编纂工作一样，都要保证质量、加快进度。他提议今后如有必要还可以在韩国、日本、越南举办类似的交流活动，各国学者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开诚布公地揭示问题，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他还对成功主办这次会议的北大《儒藏》编纂中心表示感谢。

（胡仲平）

在“《儒藏》工程编纂工作研讨会”上作的工作报告

《儒藏》工程首席专家、《儒藏》总编纂 汤一介

尊敬的韩国、日本、越南的各位专家教授，教育部的领导和张国有校长，以及我校的各位专家教授：大家早上好！

召开这次“《儒藏》工程编纂工作研讨会”的目的，是邀集日本、韩国、越南的有关专家学者与“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的教授学者，共同讨论《儒藏》精华编收录“域外文献”部分的选目、体例、校点以及组织工作等方面的问题。《儒藏》工程是由我国教育部2003年设立的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是由北京大学承担的重大国际学术合作项目。这项工作一开始就得到日本、韩国、越南学者的大力支持，而且该项目我们有四、五年的良好合作经验，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在此我对韩、日、越三国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儒藏》工程是一巨大的国际合作项目，计划先出《儒藏》精华编，它收入我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儒学典籍文献共460余种，以及韩、日、越儒学典籍文献150余种，约两亿字，将于2012年完成，之后再启动《儒藏》大全本。目前《儒藏》精华编中国部分已收到各合作单位交来校点稿227种，正式出版10册，收书32种。在梁承武先生主持下韩国学者经过三十余次讨论，完成目录的选定，他们这种负责精神，使我深深感动。前两天韩国成均馆大学金圣基教授来北大，我中心又和他们签订合作协议书，他们将配合梁承武先生完成《儒藏》精华编韩国部分的校点工作，这无疑会对我们完成此项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是有力的保证。《儒藏》精华编的日本部分在户川芳郎先生的主持下，在二松学舍的支持下，选目44种书稿已全部落实到人，并开始了校点工作，今年3月已交来5种样稿和3种完成的校点稿。我对户川先生及日本各位学者的敬业精神深为敬佩。在此，我必须特别提到，《儒藏》工程得到日本东方学会的大力支持，我谨代表“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表示衷心感谢。《儒藏》精华编越南部分在阮金山教授领导下，12种书稿已全部落实校点人选，去年11月《论语愚按》完成校点，已交《儒藏》中心。

在历史上，曾多次编有《佛藏》和《道藏》，而一直没有《儒藏》。这次由中、日、韩、越的学者通力合作，对儒家思想文化典籍、文献进行整理，集大成地编成一部有

系统的《儒藏》，可以说它将对世界学术文化作出重大贡献。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为此套大书的编辑出版写了一幅对联：上联为“三藏添新典”，下联是“时中协太和”。他称赞我们做的事，正是使儒、道、佛三家在原有的《佛藏》、《道藏》之上，又加添了《儒藏》，而使“三藏”完整了。他并认为，《儒藏》的编辑出版，对当今人类社会祈求“和谐世界”的愿望是恰逢其时。“时中”出自《孟子》、《礼记》（《中庸》），“太和”出自《周易》。因此，可以说我们从事的事业对人类社会的学术文化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我们必须努力作好，精益求精，以期对得起我们的前人和后代。

《儒藏》工程包括儒家典籍文献的编纂与儒学的研究两个方面，由于前一阶段我们把精力用在《儒藏》精华编的编纂上，而在儒学的研究方面用力不够。按计划，中、日、韩、越将各出一种《儒学史》，中国方面的九卷本《儒学史》已交稿四卷，全部将可于今年8月完成，同时《儒藏总目·经部》可于今年5月完成。日本重要儒学史著作、仓石武四郎的《本邦中国学之发展》已译成中文，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为加强儒学的研究，于去年12月出版了第一辑《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其中收有中、日、韩、越的学者的论文，我们希望各位学者给该刊赐稿。

我们召开这次“《儒藏》工程编纂工作会议”，主要目的是协调并解决中、日、韩、越在编纂中所遇到的问题。由于历史和学术思想上的原因，在对儒家典籍文献的选目、校点体例等方面有需要协调的地方，我想通过大家的讨论一定能达到基本上的一致，同时又又可以保持各自在体例基本统一下的特点。一部合作的大文库需要有基本一致的体例，这样才使读者阅读和使用起来较为方便，但根据不同情况稍作变通也是在所难免，我想经过大家讨论是可以解决此类问题的。

《儒藏》精华编的编纂工作进行了五年，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运作模式，这会对《儒藏》精华编的质量和进度起保证作用。这套“《儒藏》工程管理系统”已制成光盘，可提供给韩、日、越的学者在工作中参照。

由中、日、韩、越合作，有三百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的《儒藏》工程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合作形式。这种新的学术文化合作的形式不是短期的，如果在完成《儒藏》精华编之后，再编纂《儒藏》大全本，它将要收入五、六千种书，几十亿字，这至少要再花十几、二十年的时间，这无疑是世界历史上跨国的大事业，它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将是巨大的。因此，我们必须努力。我虽年过八十，不可能看到《儒藏》大全本的全部完成，不过我相信，有我们中、日、韩、越的学者精诚合作，《儒藏》的大全本一定能完成。

中国有句老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我们从事的《儒藏》工程是难度很大的事业，正因为它困难，我们不能不做；正因它的意义很大，完成它就是我们应该尽的责任。我定会追随参加这项大事业的中、日、韩、越的专家学者之后，尽职尽责，奉献自己的力量。

祝我们的会议圆满成功。谢谢大家来参加会议。

日本《儒藏》编纂工作进展报告

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东方学会会长 户川芳郎

各位手头应该有三种有关日方的整理资料，我就按这三种资料来说明一下我们的情况。

我们组织日本《儒藏》编委会是06年10月份，当时委任了一批委员，委员名单已发给大家，日本文献选目也发到大家手头，另外一种资料是介绍我们近几年来按时间顺序开展编纂工作的过程。07年10月份开了第二次日本《儒藏》编纂会议。随后12月份，在深圳的会上，编纂体例及校勘条例等方面都基本确定了。

我们参加深圳会议回到日本以后，马上进入通知各分担人员的环节，委托他们做一个样稿。直到去年6月底，他们都纷纷提交了样稿。根据各分担人员提交的情况，去年10月份又开了一次会议，就大家整理的情况，我们给各分担人员分发了一个“整理要领”。各位手头有一份日本编纂委员会当时编的校勘要领，是08年10月份分发给分担者的日文资料。这份整理要领是根据北大《儒藏》编纂中心的工作手册，再结合日本分担者所做样稿的具体情况重新整理的日文资料，所以这份整理要领可以反映我们目前基本的整理情况。我们的成果报告最后一条是截止到3月底提交稿件的情况。有几部书已经提交了完整的稿子，另外有几部书的样稿也提交了。我们在日本分派委托校勘工作大致上是以各学校的教研室为单位。所以，3月底的完整稿子都是大阪大学提交的，样稿都是北海道大学提交的。

各位手头还有一份资料是日本撰述书编次资料，这份资料是为了整理的方便，就我们的选目对每一种书的字数进行了统计，因为都是汉字撰写的资料，按汉字字数，不包括标点符号，做了统计，以方便编辑。精华编收录的主要是刻本，这方面我们都统计了数字，另外有一部分是抄本。目前我们的工作还在进行中。

在编纂过程中，我们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经日本编委会讨论后，再回馈到各校点者。目前我们的整理工作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所以在整理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还是以各教研室为单位进行讨论。他们也会把问题反馈到我们日本编委会，日本编委会还要和北大《儒藏》编纂中心商量。日本编委会还没有做到自己对这些问题详细讨论，因为刚刚提交了样稿，《儒藏》编纂中心还处于刚刚处理的阶段，所以目前还没有对这

些具体问题有一个很成熟的处理方法。

我个人认为对文献的校勘、校订等这些事情，日本也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古籍的校勘、整理在近代以前日本也有，尤其是战后以来日本出了比较大规模的、比较大套的古典丛书。他们整理过的古籍丛书主要是日文的古籍，但这些所谓的日文古籍主要也是用中文和日本假名写的。这种情况给日本的文献学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对它们是用日语来理解还是用中文来理解？无论是从它们撰写的情况，还是从我们整理的角度都是个问题。比如我们现在《儒藏》要整理古代日本写的东西，那么，在整理的过程中，首先是字体的问题。它们用的是日本异体字，跟中国的繁体字有很大的不同。这些文献应该怎么阅读，它们是用日文写的，还是用中文写的，这是一个问题。中国文献传到日本以后，在日本也发生了二次解释，这类书籍，如《儒藏》所用的底本，也有很多所谓的“训点”，就是他们按日文读写中国古籍的读法。所以我们目前在整理这些稿子的时候，把这些“训点”统统都删掉了，就是按照《儒藏》的要求来整理这些稿子。但是究竟应该怎么理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日本传下来的有关中国方面的古籍既有用中文撰写的，也有用日文撰写的。我们目前整理的就是用中文撰写的部分，但是在整理的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这些日文资料，也要作为我们校勘、整理的参考资料。同时，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对日文部分也要稍加关注，希望对中文部分的校勘会有积极作用。就简单的问题来说，比如异体字的问题，《儒藏》是用标准的繁体字来整理，这也是我们目前工作上的一个规范，但是，我们同时也关注这些异体字本身。日本过去很多抄本、刻本上面也有很多异体字，尽管整理要求规范化，但是整理过程中也关注这些复杂的问题。

（根据桥本秀美教授现场口译录音整理）

韩国《儒藏》编纂工作进展报告

韩国中央大学名誉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 梁承武

1. 序言

尊敬的中国教育部魏贻恒处长！北京大学张国有副校长！儒藏编纂中心汤一介主任！各位老师！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这次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特别邀请韩国、日本、越南的编纂委员来到中国，安排举办儒藏编纂工作研讨会。三国的编委前来出席会议，了解各国编纂工作的情况和经验，并互相交换意见，达成共识，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在此，本人谨代表韩国编纂委员向主办单位深表感谢。

2007年12月初和2008年11月初，韩国编委在参加深圳大学和浙江大学儒藏编纂主编会议时，已经对韩国儒藏编纂工作情况进行过报告，并且在当时向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提交了韩国儒藏编委所整理出的选目资料。

借着召开这次难得的中·韩·日·越四国编纂会议的机会，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现阶段韩国儒藏编纂工作的情况以及以后的工作方向。

2. 韩国儒藏编纂的选目标准

儒藏精华本的选目标准，是对儒藏编纂工作提出的问题中的最重要课题，也就是在进行精华本选目工作时，如何选定时代·文献·内容·数量等的问题。现将韩国儒藏精华本的选目标准，简单介绍如下：

1) 时代选目

古代（三国）到近代（1911）活动的韩国儒家代表人物和他们所著作的儒家经传典籍及历代主要儒家文集，即从新罗崔致远到朝鲜朝末期（1911）深斋曹兢燮为止。

2) 对象选目

包括经·史·子·集和儒家经典，经传注释，韩国史书，儒家人物传，经济学，性理学，礼学，阳明学，后期实学，辟异端等。

3) 内容选目

集中选定了具有代表性儒家思想、韩国儒学特色，同时又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内容。

4) 数量选目

考虑到是精华本,因此首先至少筛选100种以上的文章,然后再与儒藏编纂中心进行协议调整。此前,于2007年6月8日,韩国编委访问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通过互相交换意见,引导出了韩国儒藏编纂选目工作的重要方向。此后,2008年9月29日,与应韩国成均馆邀请来韩出席秋季祭孔大典的儒藏编纂中心汤一介主任、魏常海副主任一行召开了座谈会,商讨关于选目工作中的难点——子·集部的选目问题,变更了原来以性理论辩为中心、显现出韩国儒学特色的编纂计划。在征求过韩国编委的同意后,决定按照儒藏编纂中心的编纂体例选目。此次提交的选目资料,是韩国儒藏编委整理出的选目资料,除了子部的选目种数、具体篇章以及数量以外,尽量配合儒藏编纂中心规定的选目种数和数量,以早日完成选目工作。

现简单介绍一下通过37次会议讨论后得出的韩国儒藏精华本选目工作的具体内容,大体可区分为经史子集四个部分和编册构想部分。

3. 韩国儒藏选目工作的内容和结果

1) 经部选目

经部按照经典类别,资料分为易类:3人—3种;书类:1人—1种;诗类:1人—1种;礼类:5人—5种;春秋类:2人—2种;孝经:0人—0种;群经总义类:3人—3种;四书类:6人—8种;小学类:1人—1种;讖纬类/杂学类:不收录。共选定:22人—24种—5,132,444字。

2) 史部选目

史部共选定:9人—9种—7,067,749字;与经、子、集部相比分量较多,包括历史节要、韩国儒家传、儒家渊源、纲目等。不收录历史史书,编年体史书。

3) 子部选目

原来为了集中显现出韩国儒学的特色,子部的选目以性理之属为论辩中心,礼教之属以礼讼论争和礼教部分为中心,但配合儒藏编纂中心编纂体例的要求,将为能收录精华本的部分整理编入了《儒藏总目》。经济之属:1人—2种;性理之属:9人—14种;礼教之属:9人—9种;阳明之属:1人—2种;实学之属:8人—12种,共选定:20人—39种—5,966,851字。

当初曾收录了对于朝鲜朝各学派儒家思想的核心主题进行个别论辩和学派论辩的展开内容,使人能够更加深入了解韩国儒学的发展过程和思想特色,使一脉相通的传承和特征一目了然,但因编纂体制的限制,只能收录于《儒藏总目》里面。

4) 集部选目

集部的选目资料数量庞大,因此是最难进行的工作之一,选目对象曾达到240余人—2371种。现收录三国时代:1人—1种;高丽朝:3人—3种;朝鲜朝:28人—28种,